

表 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英] 斯图尔特·霍尔 编

文化和传播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商务印书馆

文化和传播译丛

表 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英] 斯图尔特·霍尔 编

徐 亮 陆兴华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英]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文化和传播译丛)

ISBN 7-100-03573-2

I. 表… II. ①霍… ②徐… ③陆… III. 文化理论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44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和传播译丛

表 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英]斯图尔特·霍尔 编

徐 亮 陆兴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573-2/G·477

2003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插页 4
印数 5 000册

定价: 42.00元

文化和传播译丛

总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

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作者简介：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现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包括编著）：《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编码/解码》（1980）、《文化 传媒语言》（1981）、《调控危机》（1982）、《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1988）、《现代性的构成体》（1992）等。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根据塞奇出版公司和开放大学 1997 年版译出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理论教科书，它通过一个文化研究理论的概述和五个专题的文化个案研究，表达了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观念：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它所使用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因而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符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解释的和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参与方（包括制作方与消费方）都卷入了意义的争夺，但这种争夺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意义不可能是纯个人的，而是各方协商和表征运作的结果；意义总是有偏向、有优先方面的。本书的大量插图都是这一理论的精彩分析的对象。

678



表 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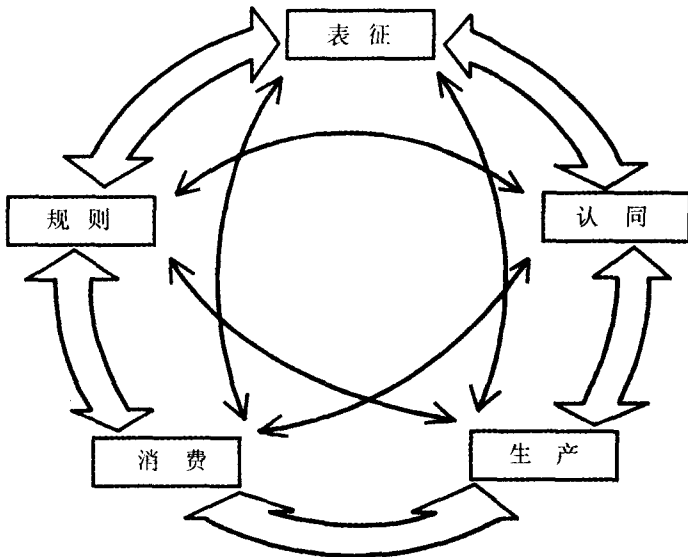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导 言	1
第一章 表征的运作(斯图尔特·霍尔)	13
第二章 表征社会: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 (彼得·汉密尔顿)	77
第三章 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亨里埃塔·利奇)	151
第四章 “他者”的景观(斯图尔特·霍尔)	225
第五章 展示男人味(肖恩·尼克松)	297
第六章 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	345
鸣谢	398
索引	402
译后记	416

导 言

斯图尔特·霍尔

本书各章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表征问题。^① 这是生产文化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也是所谓“文化的循环”(参见杜盖伊、霍尔等,1997年^②)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但是,表征与“文化”有何干系;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简单地说,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如今,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



文化的循环

但语言如何组建意义?它如何维持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共享理解从而以大致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文化?语言能做这事,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作的。在语言中我们使用各种记号与符号(不论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技术生产的形象、音符,甚至各种物品)来代表或向别人表征我们的概念、观念和感情。语言是在一种文化中表达思想、观

^① representation 一词在英语中有多种意思。根据不同语境,我们分别译为“表征”、“表象”等。——译者

^② 本书系塞奇出版公司与开放大学合作出版的“文化、媒介与认同”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书。黑体字所示参考资料为该系列丛书中另一部书,或另一部书中的另一章。——译者

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因此,经由语言的表征对意义生产过程至关重要。这是支撑本书六章的基本的和基础的观点。在考察“经由语言的意义生产和循环”时,每一章都使用不同的方法,涉及不同的例证、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这些章节一起推进和展开了我们对于表征的实际运作方式的理解。

“文化”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困难的概念之一,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它的方法。在较传统的定义中,文化据说体现一个社会中“被思考和谈论过的最好的东西”。当被表征在经典的文学、绘画、音乐及哲学作品即一个时代的“高雅文化”中时,它是所有宏大观念的总和。属于同一参照系,并对它作了更“现代”的引申的用法,是用“文化”指称那些通俗音乐、出版、艺术、设计及文学的广泛流传的形式,或指称那些构成大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活动,即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东西。多年以来,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是构成有关文化的争论的典型路数,这两个用语带有一种强烈的价值评判含义——粗略地讲,高雅的=好的;通俗的=掉价的。近年来,在更带“社会科学”色彩的语境中,“文化”一词被用来指称某一民族、社区、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已成为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这用语另外也可被用来描述或是一个集团,或是社会的“共享价值”——就像那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只不过更多地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强调。你可在本书的一些地方发现所有这些意义的踪迹。但是,如同题目所暗示的,“文化”在这些章节中会被作些许不同的、更专门化的使用。

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中,现在所谓的“文化转向”倾向于强调意义在给文化下定义时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文化因而取决于其参与者用大致相似的方法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作出富有意义的解释,并“理解”世界。

对“共享的意义”的这种强调有时会使文化听起来太整齐,太认知化。在任何文化中,关于任一话题都存在着巨大的意义上的多样性,存在着解释或表征它的不止一种的方式。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也涉及感情、归属感和情绪。我脸上的表情“说出”了有关我的一些情况:我是谁(认同),我感受到什么(情感),以及我感到我属于什么群体(归属感),这些能被别人“读出”和

理解,尽管我没有故意像传递“一条信息”那样正式地传递任何事,尽管另一个人不能很合逻辑地描述他(她)是如何达到对我正在“说出”的东西的理解的。首要的是,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

强调文化实践是重要的。正是文化的参与者赋予了人、客观物及事件以意义。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甚至像石头那样明显的事物,也既可以是一块石头,又可以是一座界碑,或一尊雕塑,这取决于它所意味的东西,也就是说,取决于它所处的某个特定的使用背景,取决于哲学家们称之为不同的“语言游戏”(即有关界碑的语言,有关雕塑的语言,等等)的东西。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我们带给它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使用事物,或把它们整合到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去的方法给事物以意义。正是我们对一堆砖和灰浆的使用,才使之成为一所“房屋”;正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思考和谈论,才使“房屋”变成了“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予事物意义是凭借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所用的有关它们的语词,所讲的有关它们的故事,所制造的有关它们的形象,所产生的与它们相关的情绪,对它们分类并使之概念化的方法,加于它们之上的各种价值。文化可以说涉及那些实践活动的全部:它们并非被简单地编入我们体内的生物遗传程序(就像敲击膝盖会引起抽搐),而是对我们来说具有意义和价值,需要他人富有意义的解释,或需要依赖意义才能有效地运作。在此意义上,文化渗入了整个社会。这就是社会生活中“人性”要素与某种单纯被生物性驱动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这一研究突出了符号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决定性作用。

意义产生于何处?我们的“文化的循环”表明,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场所,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文化的循环)被传播。意义就是赋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的东西——所以,这就与文化如何在诸群体内标出和保持同一性及在诸群体间标出和保持差异的各种问题密切相关(这是伍德沃德的主要关注点,1997年)。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所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得天独厚(尽管常常是最被忽略)的场所。意义还通过种种不同的传媒生产出来,尤其是目前,通过复杂的技术,通过现代大众传媒这种全球通讯手段生产出来,这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循环起来(这是杜盖伊的

关注点,1997年)。意义还产生于每当我们用各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或占有各文化“物”之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例行公事和实践活动中,以及以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或者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这是麦凯的关注点,1997年)。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这是汤普森的关注点,1997年)。易言之,意义问题的产生关乎我们所称的“文化的循环”里所有要素或实践——既在社会行为的规范中,也在同一性的建构和差异的标志中,在生产和消费中。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机构场所中,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具优势的一个“媒介”,就是语言。

所以,在这本深入研究“文化的循环”中的头一个要素的书中,作为开始,我们首先提出这个有关意义、语言和表征的问题。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直言之,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在这意义上,思想和感情本身在我们精神生活中就是“表征的系统”,我们的概念、形象和情感就在这系统中,代表和表征着那些在世上的或也许“在世外”的事物。同样,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信码”。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同一语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完全——逐字逐句地——讲德语、法语或汉语,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完全理解讲同一语言的任何人所说的东西。“语言”在这里的意义要广泛得多。我们的伙伴们必须讲同一种语言讲得如此之多,以致足以能够把“你”所说的“翻译”为“我”听懂的,反之亦然。他们也必须能以大致相同的方法读懂视觉形象。他们必须熟悉大致相同的发出声响的途径,以获得他们双方都会作为“音乐”来认可的东西。他们必须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解释身体语言和脸部表情。他们必须懂得如何把他们的各种感受和观念用这些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意义是一种对话——永远只能部分地被理解,永远是不平等的交换。

我们为何要把所有这些不同的生产和传播意义的方式说成是“语言”或“像语言一样运作的”?语言究竟如何运作?简单的回答就是:语言通过表征来运作。各种语言都是“表征的系统”。根本上,可以说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像语言一样运作”,并非因为它们都是被写或被说的(它们不是),而是因为

它们都使用了某些因素去代表或表征我们想说的,去表达或传递某个思想、概念、观念或感情。口语用声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语言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视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色——来“说话”。这些元素:声响、词语、音符、音阶、姿势、表情、衣服,都是我们的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在于它们的功能。它们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意指。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不如说,它们是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因为它们作为代表或表征(也就是象征)我们想要传达的意义的各种符号来起作用。换一个比喻就是,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符号代表或表征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感情,以使别人用与我们表现它们时大致相同的路数来“读出”、译解或阐释其意义。

语言在此意义上是一种意指实践。直言之,任何表征系统,只要以此方式发挥功能,都可被看作是根据语言的表征原则来运作的。这样,摄影就是一个表征系统,它使用感光纸上的各种形象,传达关于一个特殊的人、事件或场景的影像意义。博物馆或画廊的展览或展出也可被看作“像一种语言”,因为它用展示客体来产生确定的关于展览的题材的意义。音乐就其使用音符传递情感和观念而言,也“像一种语言”,尽管这些音符非常抽象,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指称“现实世界”。(音乐被说成是“用最大的声响传递最小的信息量”。)转而来看足球比赛,旗帜和标语,涂抹刻写在脸面和身体上的各种确定的颜色或符号,这些都使它可被看作“像一种语言”——就它是一种符号实践而言,它赋予隶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或一个人与当地社会的认同以意义与表现。它是民族认同的语言的一部分,是一种关于民族归属感的话语。在此,表征紧密地联系着认同和知识两者。事实上,离开了所有表征我们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文化的各种观念和形象的方法,就很难知道作为英国人,或甚至法国人、德国人、南非人或日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这些意指系统,我们不能接受这类认同(或真正拒绝它们),因而也就不能建立或维持我们称为一种文化的共同的“生活世界”。

所以,在此意义上,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惯常的看法总认为“物”存在于物质和自然世界,其物质的或自然的特点就是决定和构造它们的东西,认为它们具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意义,这意义与表征它们的方式无关。从这一观点看,表征是一个次要的过程,它只是在物完全形成,物的意义建立以后才入场的。但是自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

以来,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所以,在现已被称为“社会构成主义的途径”中,表征被认为进入了物的建构过程本身,这样,文化就被构想成了一个原初的“构造”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

“语言”因而提供了文化与表征的运作方法的一个一般范型,在已经广为人知的符号学途径中尤其如此——符号学是对各种符号以及它们作为文化意义运载工具的一般作用的一种研究或“科学”。最近这些年来,这种对意义的关注热点转向了不同的方面,人们更关心的不是“语言”运作方式的细节,而是话语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各种话语是指称或构造有关一个特定话题的实践——一组观念、形象和实践活动(或其构成体),它们提供谈论一个特定话题,即社会活动或社会中的制度化情境的方法,提供与此有关的知识行为的各种形式——知识的方式。如我们所知,这些话语的构成体,规定了在涉及社会活动的一个特定的话题或场所的构造和实践方面,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规定了在那种语境中什么知识被认为有用、相关和“真实”,哪些种类的人或“主体”体现了其特点。“话语的”成了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把意义、表象和文化视为构成性的任何途径。

在后面章节进一步展开的符号学途径和话语途径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也有一些区别。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符号学途径关心表征如何运作,语言如何生产意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学”;而话语途径更关心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即它的“政治学”。它不仅考察语言和表征如何生产出意义,而且考察一种特有的话语所生产的知识如何与权力联结,如何规范行为,产生或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并确定表征、思考、实践和研究各种特定事物的方法。在话语途径中,强调的重点始终是表象的一种特定形式或其“秩序”的历史具体性,不是作为一般的关心来强调“语言”,而是强调特殊的语言或意义,它们在各个特定时期、在特殊的地方被配置的方式。这就向我们指出了更重要的历史特性:表征的各种实践在各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运作方式。

作为文化、意义和表征运作方式的各种模型的语言和话语的普遍使用,以及紧跟其后的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围绕着“构成主义”的这两个版本(符号学途径和话语途径)的讨论,贯穿着后面的六章并在其中获得展开。“话语转向”并非无可争议,在本书中你既可以发现不同作者们所探索的立场的多种

样式,又可以发现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对它的各种批评。在本系列丛书的其他著作中(如麦凯编,1997年),各种有效的替代性途径得到探讨,那些研究采用了更具“创造性”、表现性和表演性的通达意义的途径,如质疑把音乐看作“像语言一样运作”是否有意义等。但总的看来,尽管有某些变化,本书各章对于表象和意义采用的仍是一种明显的“构成主义”方式。

第一章“表征的运作”中,斯图尔特·霍尔较深刻地全面展开了在这里只被简单概括到的有关意义、语言和表征的理论争论。当我们说“意义通过语言而产生”时,我们意指什么?本章用一系列实例(仔细理解这些例子对你很重要)引领我们经历有关这句话所确切担当的意义的论证。事物(世界上的物、人、事件)真带有自己的惟一的真实的意义(就像有一个号码牌贴在它们背上那样),而语言的任务就是精确地反映这一意义吗?抑或当我们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历史背景、一个社区、群体和亚文化转向另一个时,意义在持续不断地转变着?是不是与其说意义“说到底”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通过我们的表征系统而固定的?很清楚,表征是一种实践,它既不简单,也不透明,如它初次看起来那样。为了揭示这观念,我们需要研究一系列例子,运用特定的概念和理论,去探明和澄清其复杂性。

“视觉语言是对已经存在于那里的世界的真实反映呢?还是它通过表征世界来产生关于世界的意义?”这一问题构成了彼得·汉密尔顿的第二章“表征社会: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的基础。汉密尔顿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5年里一批法国的纪实摄影师的工作。他论证道,所有这些人都在摄影中都采用了一种特殊运作的表征途径、题材、价值观和审美形式,也就是他所称的“平民主义范式”。在此时期,这一与众不同的工作团体创造了关于“成为法国的意味着什么”的一个很具体的形象和定义,因而有助于赋予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法国文化和“法国性”的归属感以一种特定的意义。那么,什么是这些纪实性摄影形象所制造的情境、所“断言的真相”呢?它们“纪实”着什么?应根据其表征的真确性,还是根据摄影师置入这些相片的深刻的微妙的情感来评价它们呢?它们反映了那一时期法国社会的“真相”——抑或根据这真相被表征的方法,存在着一种以上的真相,一种以上的“法国性”?如何把这一工作中浮现出来的法国形象同当时横贯全法国的急速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同我们今天(真的很不同?)的“法国性”形象联系起来?

亨里埃塔·利奇的第三章“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继续讨论

8 某些相同的有关表征的问题,但涉及不同的题材和一系列不同的意指实践。鉴于第二章讨论摄影实践,即通过形象生产意义,第三章讨论了展览,即在现代博物馆语境中通过展示“他种文化”的物品和制品来生产意义。在这里,所展览的要素通常是各种“物件”,而非“词或形象”,所包含的意指实践是在一个物理空间中安排和展出的,而不是在图片杂志或刊物的页面上编排的。不管怎么说,正如本章所论述的,展览也是一个“系统”或“表征实践”,所以也“像语言一样”运作。这里,每个选择——展示这个而非那个,展示这个与那个的关系,用这个来谈论那个——都是对如何表征“异类文化”的一种选择;每一选择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产生了什么意义,二是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亨里埃塔·利奇指出了这些意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暗含于权力的各种关系中的——尤其在操作展览的人和被展览的人之间。

把权力问题引进有关表征的论争,是本书继续探查、展开表征过程和使我们对它的理解复杂化的方法之一。斯图尔特·霍尔在第四章“‘他者’的景观”中继续第三章的“表征差异”这一主题,但是把它放在更新近的通俗文化形式(新闻照片、广告、电影和流行图像)的语境中。它关注“人种的”、族裔的和性的差异是如何在一系列存于历史档案的不同视觉例证中被表征出来的。关于“差异”如何被表征为“他者”以及通过形成定见来阐明“差异”这些主要问题,都被论及了。但是,随着讨论的展开,本章研究了更广泛的问题:意指实践如何实际地建构我们“观看”的方法——这些表征实践如何在各种“观看”样式中刻下自己的印记;以及暴力、幻想和“欲望”如何也作用于表征实践,使它们更加复杂,其意义更加自相矛盾的。本章结尾设想了某些在“表征的政治学”中的一些逆向策略——意义能够被争夺的方式,以及一种特定的表象的秩序是否可受到挑战、竞争和改变这一问题。

观众和消费者如何被特定的表征实践所吸引或暗含的问题,重新出现在肖恩·尼克松的第五章“展示男人味”中,该章论及当代广告业、杂志业和消费产业中(尤其对男子而言)各种新的性别特征的建立。肖恩·尼克松问道,近年来各种媒介的表征实践是否正在形成各种新的“男性特征”。消费文化、零售业以及展演的各种语言正在构造各种新的“主体位置”(年轻人正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去认同它)吗?要是这样,那么,关于晚近现代视觉文化中男性意义正发生的转变的方式,这些形象告诉我们些什么?“男人味”,肖恩·尼克松论述道,远远超出了被以生物学方式固定和给予的含义,在各种历史语境中,增生出一批不同的意义——各种不同的“作为”男性和“变为男性”的方式。为了论述这些问题,肖恩·尼克松不仅扩展和应用了前几章提出的一些